

中國大陸的社會轉型與發展社會學的新議題

演講人：孫立平

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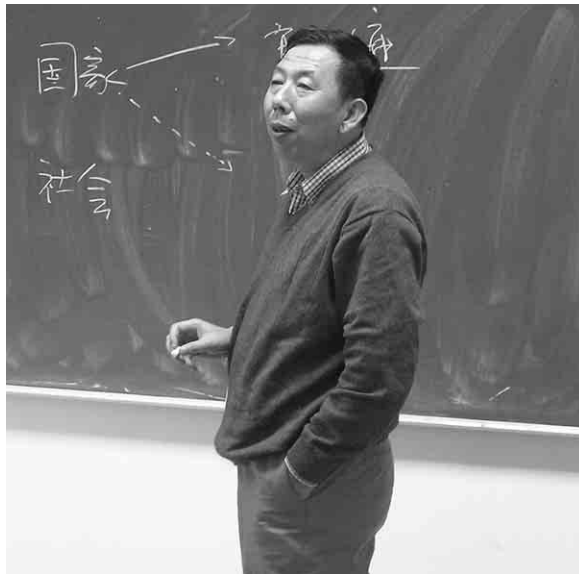
時間：2004年12月7日

中國的社會轉型，大體上是從七〇年代末始，迄今約四分之一世紀，形成諸如「改革前」、「改革後」、「改革以來」的說法，而這種說法背後的假定，則為改革前大體是一種情形，改革後成了另外一種，以「改革開放」為分水嶺，說到「改革以來」，好像是從七〇年代末就朝著一個方向在走，而這也是過去「轉型理論」背後的基本假設。

孫教授認為，這樣的框架隱約假定從七〇年代末以來的改革，就一直朝著固定方向行進，裡面有很強的目的論色彩，是一個逐步走向終點的過程。這樣會導致七〇年代到九〇年代當中的重要轉折，甚至是一些重要的逆轉被人忽略。特別是當九〇年代之後，如果仍用這個籠統的框架去看，就會導致一系列混亂。

90年代以來的社會結構演變新趨勢 貧富差距的演變

第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孫教授表示，整個社會資源配置在八〇年代基本上是擴散的趨勢。因為改革前國家幾乎壟斷了所有資源與「社會空間」，在改革之初形成了市場機制後，出現了「自由流動的資源」及「自由活動的空間」；透過市場機制，個人手裡開始有了一些



可支配可流轉的資源，在政策允許範圍內也有了個人的自主空間，這種轉變導致了社會分層結構的變化，以及不同社會力量的出現。

但到了九〇年代之後，情況發生大逆轉，資源重新從社會各角落往特定目標積聚。「從中部、西部向東部沿海地方積聚、從農村往城市積聚，從中小城市往大城市積聚、從大城市中往省會城市積聚、從省會城市中往

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積聚、然後在這個城市當中，再往少數群體、少數個人積聚。」從相關數據顯示，就收入差距的變化速度來看，世界上尚未有其他國家像中國一樣，在短短十五年中，收入差距發生如此戲劇性的變化，實際上已屬於失控的狀況。

貧富差距懸殊主要在城鄉之間，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是三倍，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中國中部作的幾個個案為四倍，如果包括城鄉二元體制下的社會福利差別在內，則可能達到六倍。而世界貧富差距第二位的，是非洲的莫桑比克，中國比莫桑比克的城鄉差距，都大上一倍。

社會分層：社會分化到分層定型化

在改革開放前，中國是個分化程度很低的社會，在收入分配上是平均主義，到八〇年代開始社會分化，九〇年代之後，孫教授認為出現了新趨勢，稱為「社會分層的定型化」，即「誰是富

人誰是窮人，到現在較為確定了」，孫教授說，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時，社會流動異常頻繁，可能今天有了機會，明天就變成老闆，但這個事情現在已經不太容易發生。

而這樣的趨勢有幾個指標，首先是階層之間的邊界開始形成，主要在一些大城市，像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窮人富人的居住區，區域的格局基本上已經形成；衣食住行等等生活方式上分層的邊界也是如此，就像哪些飯館是有錢人光顧的，哪些飯館是工薪階層，或者是農民工來吃；出入的商場與使用的交通工具也是，階層的含意非常清楚。

其次是「認同感的形成」，在社會學當中即指「我們和他們的意識」，還有「社會流動的常規化」，相對於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甚至到九

年代初的社會流動，是超乎常規的：今天是工人、明天當老闆；後天賣西瓜、大後天賣電腦，變動非常頻繁；但現今流動愈來愈開始常規化了，「教育」在流動的機制上形成很大的作用，而早先幾年的流動型態，則是由結構的體制變動所帶動的。

但教育機會的不均等也是非常嚴重。在城鄉差距的壓力下，根據一些零星的調查，八十年代的大學新生，來自農村的比例大約佔35%，前幾年調查已降至17%，雖然近幾年大學擴招很快，四、五年裡增了一倍，農村入學的大學生絕對人數沒有減少，但相對比例卻大幅度下降。孫教授形容，到城市讀書的巨額費用，讓一個農村的的孩子到北京來讀書所受的經濟壓力，和一個北京的孩子留美唸書，是差不太多的。

孫教授說，改革前中國社會是所謂的Destratification，意即「去階層化」、「反階層化」，當時社會分化程度很低。但奇怪的是，在沒有階級分化時，講了幾十年的階級鬥爭，然而現在可能是真正的有階級形成了，反倒不許講階級了。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說，這十年來是最激烈的變化，就是階級再形成的過程。

孫教授在他收集有關的文獻資料中，形成一個初步的假設，稱為「上層階級化，下層碎片化」，即上層的社會階級形成的速度較快，經濟菁英、政治菁英、知識菁英這樣聯盟的關係愈來愈明顯，並利用各種機會表達他們的意志、利益，但是下層階級形成的過程十分緩慢，這趨勢從某些社會集體行為當中也能看得出來。這樣一個形成的階級結構，可能就是上層相對來說比較穩定，下層構成階級的碎片，就是所謂「社會斷裂」的含意之一。

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演變

從國家和社會關係的角度來看，改革前是集權主義的社會，很多人說中國只有經濟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孫教授表示他是不同意這種說法的。他認為，實際上這二十年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有很大改變，就是從集權主義轉變到專制主義。漢娜鄂蘭在討論極權主義時有個重要的觀點，即這種集權主義的體制，與歷史上的專制主義、絕對主義、獨裁統治等都不一樣，重要的不但在權力核心上專制，而且也控制了生活領域的所有的資源，這是最重要的涵義。所以，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演變，最初就是從這邊走出來的。

從結構上來看出現了「資源擴散」的過程，此時集權主義如果是個無所不在的權力，那該權力就開始分化，越來越有限，而社會開始形成。八十年代末差不多發展至此，但進入九十年代後問題開始出現，例如東歐、波蘭、保加利亞，出現市民社會生長的複雜過程，「不良公共性」(bad public)是描述東歐國家的一個概念。九十年代後，研究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也出現了一些新趨勢：如果八十年代是分立，那九十年代就是一種新的結合，這種新的結合，特別是研究原來東部集體企業比較發達的地區的這些學者，如Jean Oi、Andrew Walder等等都有過他們的發現。政治精英、知識精英、經濟精英的聯盟開始出

現，在八十年代他們就已經形成。

前述的上層階級化和下層碎片化，似乎表示原來國家分立出來就是一個社會，兩者各自分立，但現在看國家也不是一個國家，社會也不是一個社會，從國家來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宏觀調控下，張力很大，更重要的是分化出來的社會，與之可能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一個是精英的社會，一個是底層的社會，使得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出現了一個新的狀況。

集體行動與社會行動

同時，由於利益的分化，各種底層社會的草根式運動開始出現，與台灣早期的運動有比較相近之處，主因之一是農民賦稅過重，其他原因還有如徵地的移民補償。像前陣子發生的四川漢源事件，移民問題非常嚴重，可以說現在沒有一個水庫完全解決了移民問題，包括了五、六十年代修建的水庫，還仍然存在非常難解決的問題。農民工的工資拖欠、勞動時間長、勞動環境差，也是最近幾年突出的問題。由於城市擴張，徵用農民的土地，造成農民失地失業，達到四千萬人到六千萬人，同時又沒有了工作，然而剛才那個政治精英、知識精英、經濟精英的聯盟，卻由徵地中獲取暴利，還有城市中的拆遷，把人們從城市中最值錢的地方趕到郊區再給予補償，但這不僅是金錢補償的問題。人不是住在一個房子裡，而是住在一個生態系統裡，這有謀生、生存的問題，就像當年上海人說「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就是指在浦西老城區有一個生存的生態，孫教授舉例，假如夫妻兩個都沒有工作，只要每天煮一百顆茶葉蛋，把它們賣完，夫妻倆就可以生存，但如果搬到浦東，但每天連二十顆茶葉蛋都賣不出去，無法維持生存了。

社會轉型與發展社會學的新議題

孫教授認為，上述的變化現象，可以把它放在「發展社會學」的框架內，發展社會學原有兩

個重要的理論傳統，分別對應到兩個不同發展地區，第一個是「現代化理論」，從早期美國五十年代，一直到最近的「再現代化理論」，所面對的是西方發達國家從傳統到現代的過程。第二種是「發展理論」，也可以說是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發展理論，後來還有在比較政治經濟學之下進行的一些研究，這個研究主要是非洲、拉丁美洲，到了八十年代之後，才把東亞加入形成發展理論。

發展社會學本來是研究社會發展，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的蘇聯、東歐、中國大陸發生劇烈變化時，發展社會學卻付之闕如，原有的理論與預言幾乎完全失效，這樣一場大的社會變革，包括發展社會學在內，幾乎完全沒有預見，何以如此？孫教授認為這與過去的知識積累與學術傳統有關，過去主要面對的是就是發達國家，或是拉美、非洲，包括一點東亞。

因此中國、蘇聯、東歐的轉型，構成了一種獨特社會發展的類型，在現在這個世界上，這種變遷的類型，既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從傳統到現代的過程，也不同於拉美、非洲，面對著一個特殊變遷的類型。也就是說現代化理論本來面對的是西方發達國家從傳統到現代的過程，發展理論是拉美、非洲和東亞這一塊。轉型理論主要是蘇東和中國這一塊。（見表一）

關於社會轉型的研究，已有重要進展，最重要的是布達佩斯學派，Kornai與Szelenyi都是匈牙利

主題	現代化理論	發展理論	轉型理論
起點	傳統社會	「落後」社會	國家社會主義
現代發展意涵 社會不平等	傳統 - 現代市場	邊陲 - 中心市場、傳統經濟國際秩序	再分配 - 市場市場與再分配的結合
現代社會分層	社會分化	很少涉及	起點是什麼？形成的什麼？
現代國家 - 社會關係	市民社會 民族國家	民族國家的形成	有限政府 bad public?

表一：三種發展社會學理論的比較

利人，Stark也是，這派研究大體上有幾個特點，第一，主要核心關懷是組織制度等靜態的結構性特徵；第二，研究方法上是大規模問卷調查；第三，理論視角是由上而下，是所謂菁英的理論，但Szelenyi也講過：「如果我是在中國，那麼我反倒可能是採取由下而上的視角。」他所研究的這些國家轉型過程中都是政體斷裂，這是他研究最重要特點之一。

如果和這個對照的話，中國大陸的社會轉型是非常不一樣的，至少有下列幾點：第一，政體的意識型態是連續的；第二，由於政體是延續的，許多重要改革在轉型過程中是透過變通方式實現；第三，在變過程當中，特別是新的制度因素，往往是以非正式的制度出現以及傳播。

孫教授認為，實踐社會學在其概念當中是結構分析，與制度分析是不矛盾的，這種實踐的狀態本身就應該是種制度和結構的運作過程，首先，有一些現象只有在實踐過程中才能夠發現，這是在「認識論」層面，第二個重要點就是實踐的增量，就是實踐要比靜態的制度結構要多出一塊，這一塊可以獨立成為解釋變項，牽涉到把研究對象究竟看做什麼，是一個靜態結構、一個模式、還是一個實踐的過程，這會非常不同，所以在面對轉型實踐過程時，首先強調就是這個過程，第二是從這過程當中發現它的邏輯，第三就是這個邏輯究竟是何種因素在起作用，第四就是人們在日常實踐過程當中使用的策略和技術。

孫教授舉例，有句話「打左燈，向右轉」，典型的說明了中國意識型態和政體連續的情況下，但在蘇東不只這樣，像私有化引起大規模的社會辯論，因為意識型態和政體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大規模的社會辯論、大規模的立法實施私有化。

這裡有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這個實踐如何進入，所以提出一個「過程實踐分析」，這和主流社會學模式有些不同，因為「實踐」的概念這幾年都由Bourdieu論述的，包括實踐的正當化、實踐的緊迫性，但緊迫性在靜態的結構上是不會存在這個問題的，因為在實踐當中有實踐的因素加進來，因此產生緊迫性的問題。

孫教授舉例，他看過一本關於印象派畫家梵谷的傳記，原先梵谷不是從事印象派繪畫，而他第一次看年輕印象派畫家的繪畫，回家後特別有感觸，梵谷說他看到了流動的空氣和陽光，反過來去看自己的繪畫是那樣的晦暗、那樣的枯澀、那樣的沒有生命力。梵谷看到流動的空氣和陽光，流動的空氣和陽光在繪畫上。流動的空氣倒是很好表現，風吹落葉滿天飛就很像是流動的空氣，但陽光如何有流動性？用紙筆如何畫出流動的陽光？雖然中學時就學過陽光是流動的，而且每秒三十萬公里，但卻畫不出來，為什麼？因為這樣的東西能夠接觸到是非常困難的，實踐的問題同樣是如此，所以試著找了一些方法去進入實踐過程。

透過這個比擬，孫教授說當時他在做農村國家社會關係時，就跟學生們開玩笑的說，想像著在畫一幅畫，畫的就是農民和國家關係，但畫出這個畫不要是中國傳統的或是西洋傳統那種繪畫，而是要畫出動態、印象派風格的國家和農民關係，就是一個實踐的觀點，面對轉型過程，且轉型過程中能不能形成一塊重要研究，是他近幾年的研究重點。

(本文由雷盈、江雨潔、潘維庭、張育寧、陳毓婷、王善嫻、韓鈴、龔南蕙、宋曉薇等人謄寫錄音逐字稿，再由潘維庭刪節整理而成。)